

加缪的 J 新人本主义哲学

iamiu de xinrenbenzhuyi zhexue

李元·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加 缪^的

J 新人本主义哲学

iamiu de xinrenbenzhuyi zhexue

李 元·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李元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80681 - 999 - 9

I. 加... II. 李... III. 加缪, A. (1913~196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876 号

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

著 者: 李 元

责任编辑: 沈 洁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81 - 999 - 9/B · 027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李 元 (1975~), 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现代外国哲学(法国哲学)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加缪的“荒谬”概念》、《对加缪“反抗”主题的研究》等有关加缪哲学研究的专业论文若干, 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一、本书的写作缘起	1
二、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9
三、本书的思路及其文献学基础	11
四、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19
 第一章 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	27
一、时代生活的冲击	27
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32
三、雅斯贝尔斯对“生存”的思考	34
四、海德格尔对人本主义的反思	36
五、马尔罗的一个重要概念	44
六、萨特思想的影响	47
 第二章 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现象学视角	51
一、对于加缪思想产生影响的现象学	51
二、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中的现象学视角	66
 第三章 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	79
一、关于自由问题的两类思路	79
二、自由是否可能、何以可能问题的提出	93

三、自由状态的语言表达是否可能	109
第四章 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	116
一、“荒谬”(Absurdity)概念	117
二、“反抗”(Revolt)概念	144
三、“荒谬—反抗—自由”的相互关系	154
第五章 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	156
一、新人本主义是加缪哲学的主线	156
二、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新探索	159
三、荒谬问题的主题化	163
四、与萨特的争论	165
第六章 总结：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得失	174
一、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贡献	175
二、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的局限性	180
参考文献	187
附录一：加缪生平简表	195
附录二：加缪作品法文本与英文本原著对照	197
后记	199

导 论



这部分内容将对研究牵涉的加缪哲学的基本背景知识加以概括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点出本书希望达成的研究目标。

一、本书的写作缘起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哲学家兼文学家。他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蒙多维镇一个农业工人家庭,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阿尔萨斯位于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在加缪那个时代还是法属殖民地。因此,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中的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地与法国本土之间、殖民地的少数民族与当地土著民之间、殖民地的本地人与从法国本土来到殖民地的外来人之间,充斥着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民族矛盾。这是一个贫穷与富有、卑微与崇高、人性善与恶……冲突相互缠绕特别集中的地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加缪的很多著作中,不时地闪烁出阿尔及利亚的身影,正是那里复杂的环境孕育了加缪关于人生、人类命运、正义、道德、反抗和自由等关乎人本主义重要理论内容的哲学思考,成为加缪思想中关注人本主义问题的所有灵感来源的原初之地。

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哲学家的生存状态影响哲学家的哲学态度与性格。阿尔及利亚的贫民窟生活孕育了加缪与人生的悲惨命运努力抗争的坚毅性格。从加缪一出生,极度的贫穷和困顿就一直伴随着他。加缪说过,他自己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而是在贫困中学到的。但是令人尊敬的是,贫穷并没有使他屈服。他依靠自己优异的学业成绩获得奖学金和老师的善良帮助,接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之后他又通过勤工俭学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接受现代大学的高等教

育。生活和求学之路的艰辛使他的创作实实在在地贴近生活而又不乏生命积淀的深刻,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人类前途命运与现实生活思考的历史责任感和理性的冷静态度。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困顿和艰辛的穷人命运抱怨过,相反却努力修养自己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建立宽广高远的人生志向。他认为只有依靠与悲惨命运的抗争才能获得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机会。这正是为何当萨特的小说《恶心》(1938年)发表之后,他立刻给予高度评价,但却批评萨特过分强调人性的丑恶而忽视了人性中的“某些伟大之处”的原因。加缪作品中的视角、观点及其表达方式,加缪的理想与才情,都离不开他在清贫困顿的生活中、社会实践的激烈反抗中对于人类现实和命运的反思与升华。他那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束缚,勇敢地在并不自由的现代荒谬世界中为人类寻找出路的人本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于人类整体生存命运的大爱与激情,都是任何脱离了社会实践生活的创作者无法企及和到达的。因此,加缪被誉为法国思想界具有鲜明特色的“平民作家”。对于法国哲学界来说,加缪更是新鲜的血液,跳动的音符。然而也正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如此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世俗社会对他的误解之中。

深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不能用“贴标签”的哲学独断论限制。在哲学史的学习中,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好的贴标签做法,即给每个思想家的总体哲学倾向贴上标签归入某一类别,以便提纲挈领。这种做法其实误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方法,是一种粗暴的哲学独断论。姑且不论哲学家的整体思想是否可以用某一个标签就加以完全归纳;仅就分类本身而言,也囿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藩篱,最终会妨碍我们对某种哲学思想的领会。正像我们所知,长期以来加缪都被贴上了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者”的学派标签。尽管1946年3月和5月他曾两次造访美国,归来后他明确拒绝萨特和存在主义,并多次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但实际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直到加缪的《反抗者》(1951年)出版以后(此时正当加缪展开了与萨特之间旷日持久的哲学论战),人们方才意识到:加缪的哲学思想的确不是能完全用“存在主义”一言以蔽之的。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加缪的名字总是与存



在主义密不可分,他仍然被视作存在主义者或者被视作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由此可见,加缪的哲学思想和作品中关于存在主义的内容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值得玩味的挑战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引发的误解与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特别相关:即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和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1943年)。《西西弗神话》的副标题是“论荒谬”,讨论的是荒谬问题。加缪自己曾表示,作品要表现的主题就是“面对荒谬的赤裸裸的人”。而同一时期的萨特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戏剧里也同样描写了人的荒谬生存状态。萨特在《恶心》中指出,存在是“虚无”的,现实是“恶心”的,人正是在“不是其所是和其所不是”的状态中荒谬地生存着。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暂时的“共在”,但由于人本质上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冲突,这就是他人就是地狱的思想;而现实社会中的人又无法离开他人而单独存在,因此悲剧便不可避免,即世界与人是荒谬的。可见,两人的观点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必须首先澄清这个偏颇的结论。萨特的《恶心》在前,加缪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在后,一时间人们自然就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将加缪也归入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学派中去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两者的思想不尽相同。萨特寓意剧的剧本背景大都表现为一种混乱、恶心的现实生活状态,有时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以此表达人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间隔”与对立。这就是存在主义者理解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质,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荒谬生活状况即人性的基点——例如,萨特就是将“感到恶心”视作认识到世界荒谬性的觉醒态度和行动表现,也就是说,人的生存是自由的,但这是在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纷争之中的自由。对于荒谬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悲观色彩,使萨特的前期哲学将问题的出路置于对精神的绝对自由的本体论设定上,以此获取人的精神解脱。尽管萨特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肯定个人的实践是历史运动的基础,但他的个人实践仍是由个人的自由意识决定的,历史的基本动因仍是个人自由。行动的辩证性质源于意识的辩证性质。在这一点上加缪与萨特不同,荒谬哲理在加缪思想中是作为思想的起点。加缪认为,所谓荒谬是一种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但还不

是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加缪从人与世界既定的荒谬关系出发,探索处于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中的人的出路,赋予荒谬人以现实实践的反抗精神,在原本并不自由的荒谬世界中积极探索人之为人根本存在方式才是他的理论归宿。相比较而言,加缪对于“荒谬”的理解是悲壮的,但不是悲观;是崇高的,但不是先验的;是自由的,但不是无方向的。同时,加缪并没有局限于存在主义关于现实人的荒谬存在状态分析和对于自由的先验设定中,而是进一步讨论了人如何摆脱“自在自由”的形而上学先验设定,探索在现实行动中将反抗作为人根本的存在方式的进程。因此,他的作品内容更多地涉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生意义的批判性反思;更注重对世界的直观体验而不是对世界的对象化认识;更关注对于生命荒谬性存在和走出荒谬的抽象主题的途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在他的作品中都成为感觉预料直观给予性,成为直观可以体验的个体感性能力,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抽象认知客体,而这种个体感性能力也因为有了人类共同的反抗性而成为作为存在本身的人本主义反抗(humanism revolt)本质。

尽管对于人本主义命题的关注一直是加缪哲学作品的主线,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荒谬主题之中。他的作品内容更多涉及了正义与邪恶、公平与道德、反抗与革命等深刻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领域。这种思维进路,可以用“从荒谬到反抗”一语加以概括。其关涉的基本问题,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指出的:在荒谬人的“存在困境”中,要进一步思考:荒谬世界中的“人”究竟怎么生存,“人”生存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加缪认为反抗就是要在现实并不自由的,甚至呈现荒谬的存在境遇中,人所具有的结成人类共同体展现自身尊严和价值的人本主义精神。与萨特关于人的绝对自由观——“人被判了自由的徒刑”这种具有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意义的先验自由本质设定相比,加缪的反抗观是崇高的,却不是先验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对于“荒谬”主题的研究和存在主义的荒谬主题的研究之间的界限——并非对于荒谬主题进行的所有思考都是隶属于存在主义哲学的。

另一个有失偏颇的结论是:加缪的作品《鼠疫》(1947年)是对《局



外人》(1942年)的否定,而《反抗者》又是对《鼠疫》的否定。如果我们将加缪思想中与萨特不一致的地方就视为对加缪自身思想的纠正和否定,与萨特思想一致的地方就视为对加缪自身思想的深入和连贯,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对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得出上述片面的结论。可以说,尽管这种观点对于加缪整体哲学思想的思考的确更近了一步,但没有深刻认识到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独立内在的思考视角——现象学视角在其整体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不妨这样看:加缪和同时代的萨特都是从相同的现象学视角出发,却最终将各自哲学引向了不同的方向。现象学视角使得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本身构成一个独立内在的逻辑体系。《鼠疫》中,反抗的人是现实荒谬世界中具体实践的个体;《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中,反抗的行动是人本主义精神与革命激情的理性结合。由此可见,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线索的贯通而不是彼此否定。《鼠疫》、《局外人》和《反抗者》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加缪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代表作,它们之间并没有哪个否定哪个的意图,三者共同构成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荒谬”思想和“反抗”思想的要件。

加缪独树一帜的现象学写作风格是采用寓言等象征手法表达深刻哲理。他那“人人都能看得懂的”作品借助散淡、朴素的简单话语在表达死亡、生存、反抗等关乎人性及其尊严与价值的深刻寓意等重大问题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现象学视角中,加缪对于人本主义哲学问题的思考采用了一种介于哲学与文学语言之间的表达方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包含着对于欧洲发展的现代性问题(Modernity)中人类自身的堕落问题(The fall)以及各种人本主义问题的富有洞见的哲学思想的论述^①,使得加缪成为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成为法国历史上获此殊荣的最年轻者。亦正因为他在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人们才将他误解为一名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正如人们对待萨特、米歇尔那样)。不过,对于加缪思想的研究愈深入,我们就

^① 诺贝尔授奖词的原文中是这样评价加缪的:“His important literary production, which with clear-sighted earnestness illuminates the problems of the human conscience in our times.”

愈会发现：加缪与同时期的萨特一样，都是重要的哲学家^①（Thomas B. Hanna, 1958）。只不过加缪使用文学表达方式作为体现他本人现象学视角的手段。例如在他作品中多见的白描式的写作风格，这可以理解为他寻求现象学方法（直观体验）与现象学原则（回到事情本身）统一的切入点。加缪这种对于细节的处理风格表现出其独到的功力：他能够以极为简洁的笔调白描式地勾勒出人物特点，又不失韵味，使作品余味绕梁。在他的作品中独到的细腻和充沛的激情，间或有电影式的长短焦距变化——时而采取短焦距的特写，时而采取长焦距的叙事，令人仿佛置身当下而印象深刻。这种独树一帜的现象学式的文学表达方式与白描式的写作风格更是令存在主义者无法模仿。

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加缪的成名之作，它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神话》共同在欧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仅仅几万字，加缪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性格独特、内涵丰富、值得反复研究的人物形象默尔索。小职员默尔索是加缪展现荒谬世界的“荒谬”（Absurdity）性的第一典型形象。《局外人》的发表获得巨大成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加缪成功地表现了“荒谬世界”中“荒谬的人”的典型形象。有人说，加缪的这篇小说中运用的语言极其简单明了，甚至到了单调、枯燥的地步。这种曾被罗兰·巴特称为“零度风格”的语言特色，即“一种没有风格的风格”：句子简短，没有严格的逻辑因果联系，叙述似乎只是忠实记录下一幅幅图景和画面。这种风格在加缪后来的作品《一个人》（1959年）中也出现过。然而笔者认为，这正是加缪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的表达方式——他用简单明晰得近乎枯涩的语言表现作品生

^① 参见 Thomas B. Hanna, *The Thought and Art of Albert Camus*, H. Regnery Co., 1958. 第三部分“III THE LITERATURE OF THE ABSURD”中的观点。“Camus, like his talented countrymen, Jean-Paul Sartre and Gabriel Marcel, suffers misunderstanding at the hands of those who know only his literary productions and are content to infer from this the philosophical position. This fallacy of inferring the whole from the part has been the bane of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but is the risk which any philosopher must run if he is to be a literary figure. Both Camus and Sartre (and Marcel in a lesser way) have found wide acclaim as novelists, and it is as such that they are known by their widest public. And it seems that the judgment of this public has been primarily founded on the ideas that they have gleaned from the reading of a few plays and novels.”



活的荒谬场景,凸显荒谬世界中生活的单调乏味(人与世界的联系只剩下荒谬),从而有力地烘托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感、陌生感和荒谬感,揭示一种并非理性的、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如果加缪进行例行性叙述,无意义的荒谬世界就会变得有意义,读者在直观上就感受不到异化世界的那种荒谬性,因此就丧失了荒谬感的直接给予性。关于这样处理的意义,加缪自己曾指出:“为了使一件荒谬的作品成为可能,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必须参与其事。然而,它同时也必须不显露出来。”^①关于默尔索这个人物形象,加缪在为美国版的《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远非是麻木不仁的,他怀着一种执着而且深沉的激情,一种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关于《局外人》这部小说的内容,几十年来挖掘不尽,其中最具有影响的还是萨特早期的解读。萨特认为加缪这部小说是“荒谬的证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抨击。由此可见,加缪采用的白描式风格正是凸显荒谬性的有力方式,这种看似“单调”的人物内心正因为孕育着比“荒谬人”更为热烈无比的激情,方才显现得如此特立独行和冷酷。有评论家就此指出,从文体而言,加缪非常擅长于笛福式的叙述文体。我们这里借用学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对小说《鲁滨逊漂流记》^②(1719年)中笛福式的叙述文体的解读来进一步理解他们的用意:丹尼尔·笛福通过强调前景中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earthenware pot)而令我们去观望那远方的岛屿和孤独的心灵^③。除了加缪作品中特点鲜明的笛福式的叙事文体之外,在作品《鼠疫》中,无论是在内容或情节的布局上,还是在人物性格的处理上,都采用了象征手段,以表现受法西斯侵略的法国人民的人本主义精神、反抗斗争精神

① 加缪著:《西叙弗斯神话》,《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第386页。

② 丹尼尔·笛福著:《鲁滨逊漂流记》,高诚译,外文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鲁滨逊漂流记》有英国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之称。它讲述了英国约克郡青年鲁宾逊·克鲁索违抗父命孤身出洋历险寻求功名和财富的故事。他三次出海经商,结果最后一次主人公结束在摩洛哥被囚禁和南美发财的冒险生涯后,在返归英国的路上遇到了海难。船触礁沉没,只有他一人幸存,逃到了南美海上的一个孤岛。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大自然和当地野人作斗争,一个人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后来他救了一个被水手背叛的船长,共同夺回了船只。几经挫折后,他终于回到了伦敦。这部小说自其问世以来一直广受欢迎,迄今在全球各地印行已逾700版次。

③ “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 Critical Inquiry, 1999.

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加缪被法国评论家评论为将小说引向现实主义新方向的代表。随着反法西斯时期创作的小说《鼠疫》的出版,加缪在学界轰动一时,他的这部作品更被誉为是比萨特的《苍蝇》(1943年)、《恶心》更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是一部涉及人本主义、政治、哲学等重大人类问题的哲学小说,是作者象征主义的天才杰作。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的哲学思想经历了极为深刻的转折,从抽象个体的抽象反抗升华为社会群体对于具体社会现实世界的类意义的反抗,可以说对于古典哲学的热情和敬意使加缪赋予希腊神普罗米修斯以现代的人本主义精神。而这时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还停留在现象学先验意识的基础上。萨特将先验自我引向意识的无方向性流动(意识流),因此自由在这种现象学视角下就成为绝对的、先验状态的存在。理论分歧发展到突出程度使两人之间的私人矛盾也尖锐起来。其实20世纪40年代,两人关于“荒谬”等问题的重大思想理路已经出现差异。20世纪50年代,随着加缪的《正义者》公演(1950年)、《反抗者》(1952年)的发表,在加缪与萨特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理论论战,这场论战围绕着是否要依靠暴力革命建立流血政权、反抗与革命是否存在界限、国家恐怖主义问题等主要哲学、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内容,两人展开辩论并终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例如在莫斯科审判问题上,萨特(包括梅洛·庞蒂)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是一场麻烦革命的正当防卫(self-defense)”。事隔多年当我们重新研读加缪的哲学思想时,发现加缪的历史经常与法国共产党以及苏维埃问题纠缠在一起。加缪对于死刑、社会非正义、国家革命与反抗的思考发人深省,它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引发今天的人们对违背人类自身权利的极权和酷刑的深入思考和再次反省。因此尽管加缪曾经试图用“新自由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意识,但本研究并不赞同 Ronald Aronson 将加缪对此问题的态度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拒绝”,认为加缪将共产党的领导视为“敌人”^①的结论,而是认为加缪是在更深远的和谐意义上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今天我们对

① Ronald Aronson (2004): "Camusart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



于加缪哲学思想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作为与萨特齐名的哲学家和作家,中国读者对于加缪思想的了解却远远少于同时代的萨特。究其原因也可以理解:其一,当萨特建立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之时,加缪却因为车祸而英年早逝,所以萨特在世时在社会政治和革命领域的影响远大于加缪;其二,读者总是需要通过作品了解思想家的。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曾经出现过“存在主义热”,并译介了不少萨特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但相比之下,加缪的作品在我国一向都译介得比较少,因此我国读者对萨特的了解也远多于加缪。

综上所述,在当代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中,加缪的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与萨特所获得的过多的荣誉比较起来,人们对加缪的关注未免太少了。对于加缪作品的研读中我却鲜明地感受到他深邃的否定和死亡精神,感受到他对于历史命运的激情和探索人类出路的独特路径。本书希望通过对加缪的研究,为恢复他的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尽自己的一点绵薄微力。

二、加缪新入本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关于加缪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无论是通俗形式还是学院派的形式,数量上都不少。但是真正关注加缪作品所体现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所具有的与流俗的宗教视角、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的工具理性视角截然不同的新入本主义的现象学视角,以及他为当代人遭遇的那种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要么杀人,要么自杀”)所提供的丰富洞见,进行文献整理和义理挖掘工作的并不多见。纵观当代关于加缪新入本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现状,我们可以基本总结为两种不同趋势的研究方向:

1. 加缪的人本主义哲学是传统入本主义哲学的翻版

这种观点认为,从整体入本主义精神实质上看,加缪的人本主义哲学不过是传统入本主义哲学的现代翻版。这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根据在于:第一,加缪小说《鼠疫》和《局外人》等主要著作的表达形式及其所反映的历

史主题都与古典人本主义精神中对人的尊重十分吻合;第二,在表达方式上,加缪的写作多采用“诗”的形式表达哲学内涵。这里的“诗”指的是狭义意义上的小说、戏剧等诗歌形式,属于题材用法。这就与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柏拉图有了共同之处:柏拉图尽管与诗人的存在方式、存在意识不同,但是他也采用了诗的表达方式。在他那里的诗是音乐。音乐就是叙事,就是戏剧,就是哲学。由此可见,加缪和柏拉图两人在诗的境界上是相通的;第三,加缪所坚持和重视的仍旧是古典人本主义的普遍人道主义,拒绝偏激的意识形态。因为通常会受到加缪赞赏的都是希腊悲剧、希腊诗人、罗马诗人以及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①、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②等。他甚至声称自己正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作品《群魔》(1871—1872 年)的哺育下长大的。也正因此,法国左派文学评论家、政治理论家和当时法共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加缪哲学,认为加缪对于鼠疫的斗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是“红十字会式的道德”③。加缪的《鼠疫》中,尽管“斗争”象征着欧洲人民对于纳粹的反抗斗争,也象征着人类反抗各种恶的历史,与《局外人》相比,《鼠疫》的斗争意识已经从个体反抗意识的觉醒(荒谬感)上升到了集体反抗意识的觉醒,但这是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以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争取独立自由的人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

2. 加缪的人本主义哲学仅适应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

持这种观点的人运用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含义来解读加缪哲学中的“中性含义”。这种观点将加缪的“荒谬哲学”、“反抗哲学”中体

①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晚年的一部著名作品,又译为《鬼》、《恶魔》。描写亚历山大二世一次镇压下的俄国革命运动,描绘了一个有才华的贵族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经历,他具有真诚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而不是一些革命者的那种矫揉造作的虚无主义。作者在书中通过描述社会各个阶层,力图说明沉湎于虚无主义如何导致了抢劫、纵火和谋杀。我国现有的两个译本:南江译《群魔》,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娄自良译《鬼》,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尼采(1844—1900),德国近代哲学家、诗人。代表作品有:《悲剧的诞生》、《论道德的谱系》、《查拉斯图如是说》、《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重估一切价值》。

③ 参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88 页。



现人本主义的思想精神中立化,并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发展角度和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人的存在角度评论加缪。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 Philip Thoday(1957)^①、Thomas B. Hanna(1958)^②等。《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高度称赞加缪的作品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是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本主义声音,法国评论界更是鲜明表示加缪的文学作品适应了工业时代资本主义要求。上述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加缪作品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一种人性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温和的、中性的含义。

三、本书的思路及其文献学基础

对于加缪哲学思想的研究之所以重视不够,这种情况一方面受制于各学科之间严密的学科界限划分,另一方面也囿于对“哲学家”这一概念的思想内涵的形而上学式理解。因此,我们今天对于加缪哲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就首先要引申出一个问题:“哲学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会说以逻辑推理写作著称的亚里士多德不是哲学家,不会说体系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不是哲学家,更不会说擅长哲学方法论的胡塞尔不是哲学家……那么集文学家、评论家、小说家身份于一身的加缪是哲学家吗?这个问题涉及哲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哲学与文学最大的联系,可以说是“思想”、“是创作”。文学家的作品总是有自己的逻辑、推理和情节的,并且他们对于明晰性也有所要求。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创作家。他有他的任务、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情节。他有他的创作结局。在加缪看来,“伟大的小说家是哲学小说家”^③,他认为哲学与文学是相通的。思想是目的,文学写作方式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而手段的选择又与所企图达到的表达目的直接相关。传统体系哲学家们之所以选择逻辑演绎和推理而不用形象来写作(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乃是为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使得哲学家能够在

① Philip Thody, Hamish Hamilton(1957): Albert Camus: The Study of his work.

② Thomas B. Hanna (1958): The Thought and Art of Albert Camus, H. Regnery Co.

③ 《加缪全集》(散文卷I),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6 页。